

品不能离开“各种各样的人物”的“创造”。现在有一种论调，认为作品可以淡化人，甚至可以不用写人。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。即使不写人的性格，也要写人的情绪、感受和想象；即使不写个体的人，也要写群体的人；即使不写现实中的人，也要写与现实有关的想象中的人；即使没有直接出现的山水作品、花鸟作品和动物作品中，也寄寓着人的情感和理想，弥漫着人的品性和氛围，是人的对象性的表现。所以，审美反映以人为中心，可以说是一个普遍规律。当然，作为审美反映中心的人，不是抽象的人，不是超时代、超阶级的人，而是现实的人、社会的人、活生生的人，这也是《延安讲话》反复加以阐明的。

审美反映既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反映，是对活生生的人的反映，那么这种反映必然是理性把握和情感体验相结合的反映。《延安讲话》提出在反映过程中，不仅要“观察”、“分析”、“研究”，还要进行“体验”的观点，无疑地说明了理性和感性结合的重要性。这样，在反映过程中，既反对了排斥感性的唯理主义，也反对了排斥理性的非理性主义。

典型化，是审美反映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。只有经过典型化，生活美才能转变为艺术美：“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，更强烈，更有集中性，更典型，更理想，因此就更带普遍性。”不经过典型化，生活的本真、历史的深蕴就难以其典型的、理想的形态，生发出震撼人心、唤醒灵魂、陶冶情性、塑造人生的深远力量。所以，认为典型化不再是审美反映中的普遍规律的观点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审美反映毫无疑问带有个别的、特殊的、感性的、偶然的因素，但是这些因素若不通过种种中介大致趋向于（而不是归结于）一般、普遍、理性和必然，那么你那个审美反映也就失去了他人认同、感受的可能。问题并不在于审美要不要典型化，而在于不要把本来千差万别的典型化定于一种模式。这是我们学习《延安讲话》精神时，要加以注意的。

《延安讲话》所阐述的反映论，是唯物的，实践的，能动的，又是审美的。这样，就在反映的问题上反对了唯心论、直观论、机械论以及审美取消论，而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，将反映的实践性、能动性和审美性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
《讲话》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

孙 党 伯

50年前，毛泽东同志发表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总结了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，提出了我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、方针和政策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在《讲话》的指引下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，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得到了蓬勃健康的发展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《讲话》所论述的根本问题，是文艺“为群众”和“如何为群众”的问题，这是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渴望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。“五四”时期提出过“国民文学”，“平民文学”的口号，“左

联”时期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并多次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讨论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反动派不让作家同人民接近，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又未能认真转变立场，他们所谓的“国民”、“平民”实际仅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，“大众化”也往往只被看做是形式的通俗化。这样，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，却存在着两个显著弱点，一是内容上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，二是形式上缺乏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，以致阻碍了新文学与广大民众的联系。

为了彻底解决文艺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，使文艺成为“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”，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，并发表了重要的《讲话》。他不仅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，首先是“为工农兵服务”的方向，而且解决了保证这一方向得以贯彻的一系列理论认识问题。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，归根到底是由作家的立场、世界观决定的。《讲话》明确指出，作家要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“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，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”。以往新文学之所以长期存在脱离民众、脱离实际的缺点，就因为有些作家没有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，“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。”要创造“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”，其关键就是作家必须转变自己的立场，《讲话》号召作家“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，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、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，逐渐地移过来，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，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。”这是一切作家转变立场的根本途径。

《讲话》还根据文艺是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的原理，指出人民生活“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”，号召一切革命的有出息的文艺家“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，到火热的斗争中去，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”，熟悉各种人和事，吸取丰富的创作源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作家的思想感情来一番转变和改造，才能创作出表现工农兵生活并为工农兵所欢迎的文艺作品。《讲话》深刻指出：大众化就是“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。”这不仅澄清了以往在大众化讨论中的种种糊涂认识，而且指明了文艺“大众化”的正确途径。

同时，《讲话》还从人民群众的文化状态和革命斗争现实的需要出发，强调作家要重视文艺的普及，对于当时的工农群众来说，第一步需要的还不是“锦上添花”，而是“雪中送炭”，应先做文化和文艺的启蒙工作。但也不能忽视提高，要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，这就是“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”，“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”，以保证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贯彻。

总之，《讲话》关于文艺“为群众”和“如何为群众”问题的一系列创造性的精辟论述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，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。

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同志《讲话》的精神，认真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，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，努力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使边区文艺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。许多作家纷纷走向农村、部队和工厂，长期和工农兵群众生活在一起，参加实际的工作和斗争，成为工农兵行列中的一员。他们既改造自己，也帮助群众开展文艺活动。这样，在《讲话》精神鼓舞下，延安和各根据地的群众性文艺运动便空前活跃。1943年春节期延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秧歌运动，受到群众欢迎，其中鲁艺在原有秧歌基础上大胆创造的新秧歌，还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。各农村、部队的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也有蓬勃的发展，产生了一批控诉剥削、歌颂解放的作品，比如李有源、毕革

飞、韩起祥、王尊三的一些作品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，它们内容进步，风格刚健清新。

与此同时，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在《讲话》精神的指引下，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过程中，创作了大量表现新的时代、新的群众的文学作品。其中如赵树理的小说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、李季的长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阮章竞的长诗《漳河水》，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新歌剧《白毛女》、丁玲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、周立波的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等，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。解放区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而且同以往的文学作品相比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表现出以下的特点。

首先，人民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成了文艺作品最主要的题材和主题。据周扬统计，收入反映解放区文艺创作成果的《人民文艺丛书》中的177篇作品，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01篇，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反封建斗争的41篇，写工农业生产的16篇，共计168篇，占总数的89%以上。上举《小二黑结婚》等优秀作品，都是描写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。这些作品通过对人民革命斗争的描写，生动的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。在“五四”新文学中，描写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成了文学作品的两大题材。解放区文艺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变化，既表明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，也反映出广大作家的立场已有了转变。

其次，工农兵群众成了文学作品真正的主人公。在旧文学中，作品的主人公多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。“五四”新文学中，虽然也有以工人农民为主人公的作品，但他们大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。《讲话》以后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品，都以劳动人民做主人公。小二黑和李有才、王贵与李香香、赵玉林和郭全海，都是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。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和勇敢的斗争精神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。当他们摆脱了压迫和剥削，砸烂了精神的枷锁以后，便在生活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聪明才智。

再次，初步显露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色彩。解放区作家都积极学习群众的语言和民间文艺，力图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生活。他们十分注意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。比如，《白毛女》就是在广泛吸收秧歌、民歌、民族戏曲的特点的基础上而创作出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歌剧。《王贵与李香香》是直接用陕北民歌《信天游》的形式创作的，清新自然，形象生动。赵树理的小说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，其语言完全是大众化的。他的语言完全来自群众，但又经过精心的加工，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。

由上可见，在《讲话》的指引下，解放区文学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。正如周扬同志在《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》一文中所说：“假如说‘五四’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革命，那末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，可以说是继‘五四’以后的第二次更伟大、更深刻的文学革命。”

《讲话》与建国后17年文学

曹 永 慈

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河中，建国后的17年文学，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。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却占有重要地位，具有深远意义。建国后17年文学，是和社会主义